



中国与世界

第六辑

CHINA AND THE WORLD

刘德斌◎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与世界

第六辑

CHINA AND THE WORLD

刘德斌◎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与世界·第六辑/刘德斌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 - 7 - 5203 - 2210 - 2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国情—研究②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D6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199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曦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03 千字
定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与世界》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沛 马 敏 王存刚 王胜今 王逸舟 冯绍雷
刘中树 刘家和 刘新成 孙正聿 成中英 朱 寰
朱瀛泉 余伟民 张国刚 张睿壮 李少军 李剑鸣
杜维明 陈志敏 陈志强 林 沅 金灿荣 侯建新
秦亚青 钱乘旦 崔立如 阎学通 黄仁伟 黄 平
黄俊杰 潘志平 Barry Buzan(英国)

Brantly Womack(美国)

主 编 刘德斌

编辑部主任 孙丽萍

编 辑(按姓氏笔画排列)

孙丽萍 吴雁飞 崔 悦 富育红 颜 震

主 办: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地 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吉林大学前卫校区公共外交学院 213 室

邮 编:130012

联系电话:0431-85166795

网 址:<http://sipa.jlu.edu.cn>

Email:chinaworld@jlu.edu.cn

编者按

刘德斌

近年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高度的变化性和不可预测性。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失灵,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似乎正在卷土重来。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而改善,相反变得更加紧张和对抗。中美关系也因为美国蓄意制造摩擦而紧张起来。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办方以“后真相、后西方和后秩序”作为2017年研究报告的题目,使这几个词语成为当今世界现实的生动写照。实际上,特朗普的当选及其所推行的“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不仅扩大了美国与他国包括与其盟国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不确定性。2017年年末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把中国和俄罗斯直接宣示为美国最重要的安全威胁,抨击中国和俄罗斯是“企图改变世界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为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的发展都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与世界秩序的不确定性相比,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从而把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就一直在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而且能够协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开辟新的路径。可以说,在当前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中国的“自信”与世界的“犹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是对世界的未来最有方略的国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希望与各国共同努力的

大方向,同时也让中国自身承担起了更为艰巨和更为重大的国际责任。中国所展示的一个新兴大国的情怀和方略,正好与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形成鲜明对照。当世界第一强国企图通过“美国优先”而“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时候,刚刚富起来的中国却把自己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拴在一起,愿意带领世界走出一条共同发展和进步的道路。为了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目标,有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具有了更为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为了深入探讨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本期《中国与世界》特意开辟了“中国与世界:前沿问题探讨”“欧亚大陆:热点问题聚焦”“中外关系:历史与现实问题”三个专栏,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青年才俊就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变化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三组文章既有理论上的探讨与反思,也有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既有历史上的追根溯源,也有立足于现实的推测和前瞻,相信会给读者带来诸多新的信息、新的启发和思考。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的研究和探索,不仅涉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方方面面,也能够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提供必要的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相关的探索不仅是现实层面的,也是理论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归根结底,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探讨应该导向一种新的中国叙事和世界叙事,导向一种中国对自身和世界新的认同的探讨。这是崛起的中国应该和能够做到的。本期是《中国与世界》2011年创刊以来的第六辑。我们期待能够为读者不断地奉献优秀作品,也期待得到读者朋友的批判指正。

目 录

编者按

刘德斌 / 1

一 中国与世界:前沿问题探讨

历史与理论的联系:个人的反思

巴里·布赞著 张永喆译 / 1

国际法与“修昔底德陷阱”之超越

何志鹏 魏晓旭 / 9

民粹主义与全球转型

乔治·劳森著 李东琪译 / 33

“特朗普主义”与世界秩序的转型

孙兴杰 / 43

二 欧亚大陆:热点问题聚焦

20世纪以来中东格局的演变及其影响

黄民兴 / 57

中国—东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作

任晶晶 / 77

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恐怖主义问题关联

富育红 / 93

布热津斯基的思想、理想与遗产

时佳希 / 107

三 中外关系:历史与现实问题

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企业组织形态之比较

张乃和 / 120

试论传统东亚秩序的地缘学分析框架

陈康令 / 132

美国出口管制的调整动向及其对中美信任关系的影响

包广将 / 142

大湄公河次区域治理中的 NGO 角色:全球环境研究所

和日本国际志愿者中心的比较分析

颜 震 杨依众 / 158

历史与理论的联系：个人的反思

□ 巴里·布赞 著 张永喆 译

作者简介：巴里·布赞，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张永喆，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

由于笔者并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学家，因此本文的讨论参考了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的论文。我所做的研究是以自身学术经验来诠释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历史之间丰富而紧密的联系。

为了阐明理论与历史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原创的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会呈现出什么特点？毫无疑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理论。它们假定一种无政府的国际结构，这一结构既是基于历史准则，同时也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这一理论忽视了大国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和将其自身意志强加于他国的事实。

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政治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权力的分散得到高度重视。这些历史背景构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渊源。现实主义兴起于17、18世纪，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著名的现实主义者有修昔底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特里赛克等。自由主义则来自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美国内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贸易和资本的国际流动。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有斯密、潘恩、密尔和科布登等。英国学派源自19世纪的欧洲外交及其后期法学家的实践，也源自格劳秀斯等理论家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

19世纪的欧洲,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既是思想家,也是革命家。后殖民主义则植根于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在新殖民主义实践和1945年以来的国际社会这一大背景下,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不仅扩展到非西方世界,也影响了西方世界内部。

中国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什么特点?它会基于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理论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不会基于“无政府状态”这一假设,它所要做的是防止这种暴力竞争而导致全局被控制的权力分散。中国的理论倡导的是一种以联合、秩序与和谐为特征的等级结构。对于中国来说,源自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给予了其政治理论家很好的经验,即这一时期的暴力和战乱决不允许重演^①。从历史、理论和规范假设出发,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天下”理念构建了地缘政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分散的国际体系或者国际社会的基础。等级结构中的外交、战争与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作用有很大的差异。为了进行符合儒家价值的文化实践,“面子”和关系主义(并非理性主义)成为外交和战争背后的主导思想。在中国,理论、实践、文化和“中央之国”的思维框架中,等级秩序比物质实力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相比较欧洲,在中国王朝与帝国(而非主权和主权平等)在保证政治统治合法性方面发挥了更为持久的作用。换言之,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以及不同的政治哲学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将呈现多元化。

以上是对问题提纲挈领式的讨论,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详细阐释,但是,我认为它已经足以阐明历史与理论的关联,还说明这些历史事件本身也具有研究价值。以此为出发点,我简要介绍一下在我的研究中的五个历史或理论的案例:互动能力和国际体系;发展不均衡;分化理论;历史分期与基准时间;权力分配的模式。这些案例表明,国际关系理论深深植根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而如果没有理论假设,对于世界历史的分析就无法深入进行。

案例一 互动能力和国际体系

我和利特尔合著《世界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建构》^②一书,主要

^① Pines, Yuri, *The Everlasting Empir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nd its Imperial Lega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目的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检验国际体系概念的合理性。它的写作动机在于追溯和寻找国际体系的源头,并采用国际体系这一概念分析世界历史的进程。它的主要课题是将历史观点与国际体系的抽象概念相融合。沃尔兹(1979)^①等现实主义者将国际体系描绘为一成不变的抽象概念,而本书则阐释了国际体系演进的历程。我们发现,国际体系在不同的时空下内涵是不同的,而其中的关键变量就是所谓的互动能力,即系统的承载能力——人员、资源和思想在系统内流动的速度、范围和成本。互动能力一定程度上受地缘影响,但主要还是受到特定时空下社会与科学技术传播和交流能力大小的影响。数千年前的一些国际体系与现实主义所描绘的“完全”体系差异巨大。在可用交通工具只有帆船、马和骆驼的时代,交通成本非常高,陆上交通的成本尤其高昂。此时的国际体系便仅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只有一些昂贵的奢侈品能通过邮驿体系在陆路穿梭。在19世纪之前,不存在沃尔兹式的“完全”国际体系(即结合军事、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系统),19世纪以来的社会和科学技术革命带来了蒸汽机、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电报、电台、互联网的出现和常设国际组织的发展。随着这些技术进步,互动能力大大提高,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小。从历史学的角度重新定义“国际体系”意味着添加了进化的维度,并强烈质疑了新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定义为一个抽象的永恒概念的可行性。

案例二 发展不均衡

在近期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贾斯汀·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重新审视了托洛茨基关于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UCD)如何将“国际”概念化的过程^②。罗森伯格巧妙地运用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反驳沃尔兹的观点,即反对在无政府体系下社会化和国家间的竞争使国家成为“类似的单元”这一观点。根据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认为不同时期、文化传统和

^①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 - Wesley, 1979.

^② Rosenberg, Justin,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Part II: Unevenness and Multiplicit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3:1, 165 - 189. Rosenberg, Justin, "Kenneth Waltz and Leon Trotsky: Anarchy in the Mirror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0:2, 183 - 230, 2013. Buzan, Barry and George Lawson,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n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in Alexander Anievas and Kamran Mati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World History: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over the Longue Durée*,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171 - 184. Also published in Chinese in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3 (2016) 17 - 25, 2016. Rosenberg, Just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ison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0:2, 127 - 153, 2016.

地理位置会对思想的传播产生影响,国家不会成为类似的单元。因此,德国、美国和日本现代化不是英国的翻版,中国的现代化也不是再造一个美国或俄国。在罗森伯格思想的基础上,布赞和劳森提出了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的想法^①,即关于“资本主义多样化”的新兴现象和19世纪现代革命的研究。布赞与谢恩伯格于2018提出通过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试图分析为什么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形态差别如此巨大。现代世界政治中,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许多深刻而重大的差异,例如它们的发展水平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国家能力不同,国家实力也不尽相同。

这些不同是如何产生的?布赞和谢恩伯格通过研究发现,在现代国际社会,用不同地区与国家存在的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巨大差异来探讨这个问题,然后采取四个不同的路径来说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四个路径分别是:不间断发展(如欧洲,区域系统能够自我演变而不被外部权力主导);共和制度(如美洲和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在很大程度上被外来的欧洲人所取代,造成了历史性的分离);殖民化与非殖民化(如非洲、亚洲以及中东地区,这些国家与地区在历史上都经历过一定时间的殖民统治);压力与改革(如日本、中国、土耳其以及俄罗斯,即使没有殖民地存在,但这些国家在外国的压力下仍然走上了自我改革之路)。探究不同的历史起源以及长时间以来不同历史路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也解释了目前全球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和文化多样性。因此,这也更加佐证了罗森伯格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UCD)。

实际上,这个案例展示了如何运用历史的观点帮助学者研究抽象的理论,并且进一步简化现实,便于他们洞察真相。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沃尔兹和罗森伯格之间的选择或者是相同以及不同的单位,而是承认同质化和差异化可以同时历史进程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案例三 分化理论

经过一系列研究,布赞和艾伯特^②试图将经典社会学的差异化理论带入国

^① Buzan, Barry, and George Lawson, "Capitalism and the Emergent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90:1, 71-91, 2014b.

^② Albert, Mathias and Barry Buzan, "Securitization, Sectors and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Security Dialogue*, Special Issue, 42: 4-5, 413-425, 2011. Albert, Mathias, Barry Buzan and Michael Zürn (eds.), *Bringing Sociology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a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Buzan, Barry and Mathias Albert, "Differentiation: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3, 315-337, 2010.

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之中,并将此作为分析国家和国际系统及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分化理论有三种基本的特性:

单位性——单位是类似的,但地域之间存在差别,如部落、国家、地区。

层次性——级别或地位的差异造成的单位不同,如帝国、贵族、极权、种族主义。

功能性——单位不是完全类似的,要通过技能、知识和目的来区分的不同单位,例如经济、军事、宗教、政治、社会、法律等等。

这一理论工具有历史的维度,这三种分化特性也被视为界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方式。单位性分化代表了典型的氏族社会;层次性分化标志着古典王国和帝国的产生,而功能的分化标志着社会经历了现代性的革命。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种高级形式都脱胎于低级形式,而又高于它。使用分化理论分析国际社会揭示了可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有益方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区域分化可能是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中每一个“相似”个体,也有可能是区域内地理与文化产生的差异性。专制分化旨在说明其基本层次结构以及世界的等级和地位的差异:即大国的特权、核心—边缘结构的层次、种族理论的不平等。功能性分化主要是指世界体系的专门化,包括全球经济、国际社会、国际法、国际政治、全球环境、世界体育等。

布赞和谢恩伯格利用这种构想建立了基于分化主导形式的全球性国际社会(GIS)理想类型:相同的单位、区域和全球层次、特权和功能。然后,他们利用这些模型来探讨如何评估国际社会的实力,以及它未来是否会走向更强或者逐渐衰落的问题。当然,英国学派在分析全球国际社会时,总是试图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但差异理论的运用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每一个模型都提供了评估不同行为体实力强弱的标准,与此同时,这个模型还允许以一种更加细致入微的方式来展示历史与全球国际社会的演变过程,并且预估了其发展前景。

案例四 历史分期与基准时间

布赞和劳森提出了关于国际关系中基准时间的讨论^①。基准时间对于我们

^① Buzan, Barry and George Lawson, “Rethinking Benchmark D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 437–462, 2014a. Buzan, Barry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a. Buzan, Barry and George Lawson, “Twentieth Century Benchmark D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Three World War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Beijing), 1:1, 39–58, 2015b.

如何组织和思考国际关系理论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代表着理论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交汇点。例如,国际关系学是如何使用1945年和1989年这两个不同时期,来区分多极结构和两极结构、两极结构和单极结构的?然而,如此重要的基准时间划分是如何得出的,按照什么标准划分,这些问题却从未被提起。事实上,这一基准时间大部分是西方主要战争及其和平结束的日期。这恰好解释了现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四个基准时期: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89年(冷战结束)。但是,如果战争开始和结束是设定基准时间的关键标准,那么为什么1815年(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和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却不是基准时间之一呢?日俄战争不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但是却是非白种人对欧洲大国的胜利,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振聋发聩。这极大地冲击了作为当时世界政治主流的种族主义观点,也同时激发了整个亚洲的反殖民情绪。

然而为什么普遍将基准时间设定为战争结束的日期呢?从理论角度看,这种方法比现实主义更容易理解国际关系理论。那为什么不用其他标准来衡量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变化?

布赞和劳森认为存在诸多确定宏观历史节点的可能方法,并通过这些历史节点,来扩大基准时间理论的包容性。革命通常会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巨大影响,例如美国(1776)、法国(1789)、俄罗斯(1917)、中国(1949)、伊朗(1979)等革命实践,并且这些革命的影响通常反映出概念与建构主义的变化。国家社会规范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是国家政治合法性从国家主义向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转变(19世纪);从人类不平等的假设到破坏种族主义和帝国的人类平等假设(20世纪中叶)的转变;在全球经济的组织原则的转型上,从重商主义向市场化(20世纪末)和环境管理思想(21世纪初出现)的转变。从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交通运输技术的重大转变应该被视为国际体系变化的重要事件。就交通运输这个方面而言,人们可能对于交通工具的进化更为熟稔,例如:远洋帆船(15世纪)、轮船和铁路(19世纪)、电报(19世纪)、飞机(20世纪)、互联网(20世纪末)。但是从更大范围来看,人们可能要考虑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例如19世纪的现代化革命标志着从传统的农业技术和社会结构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

在日常教学和论文的撰写中,我们设定的基准时间塑造了对国际关系历史阶段性的认知。与此同时,我们用来确定基准时间的历史规则也影响了理论研究,使某些理论获得核心地位而其他理论被边缘化了。因此,我们要仔细思考如何构建基准时间,并充分意识到“某些选择可能带来扭曲的后果”的预判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对全球国际体系(GIS)的影响是否完全一致?

布赞和劳森运用具有普适性的标准进行理论分析,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更为深远。1989年真的是一个大变革,还是只是对偏爱极理论的新现实主义学者而言才是大变革?为什么1989年在基准时间设定中被给予过高的强调,而中国在1978年进行的改革开放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事件?

历史视角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现在看起来很重要的事件,可能在几十年后将变得无足轻重。就好像“9·11”事件在2001年之后的几年中的意义不言而喻,一个世纪以后,它的影响是否仍然重要取决于恐怖主义是否仍然是国际安全中的决定性问题;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它将逐渐消失并服从于某种新的大国竞争格局。因此,对宏观历史结构形成的周期性思考是一个不断重新评估和重新定义的工作。

案例五 权力分配的模式

最后一个案例是布赞和劳森^①在研究19世纪全球现代性转型时发展的权力模式时提出的概念。在这一案例中,一项基本的历史研究产生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专注于研究权力分配,而这主要是由物质因素所决定的。权力被划分为极理论、霸权稳定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19世纪的全球化转型表明,权力模式可能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概念。这种模式包括了社会、政治和技术基础及其来源。当我们在研究现代化革命进程时,我们发现新的权力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19世纪全球中心—边缘体系的迅速建立。最显著的是西方人(以及日本人)借以对抗前现代社会的技术^②,包括:从汽轮机到医药的技术变革。但更为深刻的是,在前现代化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心理、经济和政治发生的改变。这种变化为军事力量的增长提供了支撑,并且在掌握了现代革命的少数社会和多数尚未开展现代化的社会之间开辟了巨大的力量鸿沟。

与某个权力模式内的权力差距不同,不同权力模式之间的差异很难缩小。在某个权力模式内,缩小权力差距只是获得更多资源和学习先进经验的一次

^① Buzan, Barry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a.

^② Headrick, Daniel R., *Power over Peoples: Technology, Environments and Western Imperialism 1400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尝试。例如普鲁士在18世纪可以通过招募、装备和训练更多的士兵来满足其更大的权力的发展。如果想弥补权力模式上的差距,那么就必须要经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革命,才有可能成功。如果仅仅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国一样,只是在它们的军队中更新西方的军事装备,这将是徒劳无功的。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工业条件不能有效地支持或使用现代军事技术。事实上,日本经历了一系列现代革命,从早期就大力地支持和利用现代武器。它与意大利和俄罗斯一起,共同构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19世纪权力模式差距伴随着开放日渐加大,这使得当时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压力下被迫“开放”,与此同时,也使得日本在中国获得的权力越来越多。

权力模式的变化是不常见的。布赞和劳森研究的19世纪各国案例表明,由于这些模式难以复制,因此产生了持久的权力鸿沟。当这种变化产生时,它本身比权力分配的变化更为深刻,尽管它们也可能改变权力的分配。这个概念的构建需要更多的研究。19世纪的案例似乎很明显并且有说服力,但还有其他类似的事件吗?而我们又该如何区分19世纪的权力模式的全面而又剧烈的变化(即质变与量变如何区分),例如1945年因核武器的问世而引起的变化?究竟什么样的标准可以衡量权力模式的变化?当前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革命是否意味着另一种权力模式正在生成?这些课题仍然是如何将历史的基本观点转化为理论框架的重要工作之一。

结 语

在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方面,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对历史进程做了自己的解读。在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制度)更少地以西方为中心、更多地关注事实上的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任务是发掘中国在历史和政治理论中的独特资源,并将其应用于提出更具有普适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历史社会学为理论与历史的整合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概念和理论。它们既可以适用于对中国历史的分析与解读,又可以根据中国历史和政治理论对广义的问题进行质疑和修正。这些概念同样为与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场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分别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例如罗森伯格的上述成就)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那么这两者似乎不会产生任何交集。这也是我们可能会错失的机会之一,要尽快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加以解决。

我希望这些有关我自己的理论与历史的经验,有助于阐明本期乔治·劳森关于国际历史社会学的看法,而这两篇文章理应得到富有成效的讨论。

国际法与“修昔底德陷阱”之超越

□ 何志鹏 魏晓旭

摘要:“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这一观点被修昔底德提出后,在两千余年后的今天发展成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并被部分学者用以论断中美关系。尽管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各学派纷纷提出各自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分析及超越方法,但这些路径都仍需继续完善。相较而言,国际法可以弥合前述方法的不足,并发展为一条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新路径。这便需要对国际法、对由国家意志彼此交织而成的国际体系,以及二者关系有着正确的认识。以现实因素的探究,目前国际体系尚有偏离正轨的危险;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也需要通过准确把握、运用国际法,对体系的稳定发展予以平衡和保障;这是从单国的角度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过程。

关键词:国际法;修昔底德陷阱;国家意志;国际体系

作者简介:何志鹏,法学博士,“2011 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公共外交学院教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研究人员;魏晓旭,吉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 导论:问题的提出

大国(Great Powers)始终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占据

主要地位。^①早在古希腊时期,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指出:当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构成威胁时,二者必然产生冲突。^②这一思想得到了后世不同时代学者乃至国家的认可,并最终产生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

不可否认,修昔底德的观点在其后两千余年内能够不断发展,必然有其现实基础。本文也认同其所描述的现象及相关可能性。但倘若深入本质追问,该理论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必然性?换言之,面对横亘于国际社会发展之路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国家是否只能别无选择地跌入其中、越陷越深、直至没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代表了大多数现实主义对国际社会前景的悲观预期;而在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看来,修昔底德陷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回避。

对于从不同视角审视国际社会、但却同样基于国际社会而运作的国际法而言,应当如何看待修昔底德陷阱?又应当如何看待国际关系各学派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态度及应对?倘若修昔底德陷阱注定成为现实,国际法将何去何从?倘若修昔底德陷阱存在超越之法,国际法又能发挥何用?这些疑问,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认为,分析国际关系不应单纯地以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进行“沙盘推演”,而应将其置于一系列国际法规则的体系中,全面考虑国际法对国家等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外在约束力和内在影响力;基于此,凭借国际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便存在了可能性。此外,既然修昔底德陷阱很多情况下都指向了中国,从中国立场出发、结合国际法考虑修昔底德陷阱的超越则是本文的另一目的。^③

在此思路之下,本文将首先对问题背景进行简要介绍并引出问题,深入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所描述的现象和所蕴含的本质,并对其合理性进行分析;其次,将根据此种分析,探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各学派所提出的超越路径的优势和不足;再次,根据我们所发现的不足之处,论述作为超越路径的国际法能够发挥何种作用;最后,从中国的角度继续扩展,并探索中国凭借国际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种种问题,对全文进行简要总结和展望。

① 参见[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193页;另见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revised by Kenneth W. Thompson and W. David Clinton,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06, p. 347.

② 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页。

③ 本文从国际法角度探讨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这不表示国际法 is 唯一的超越路径;此外,鉴于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显著重要性,本文着重从国家的角度进行论述,对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暂不过多涉及。